

論先秦的兩種「問疾」話語模式及其變例： 以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晉 侯夢大厲」為例

蔡瑩瑩*

摘 要

本文以先秦「問疾」話語模式為主題。首先提出兩種類型：一為「問疾」，呈現臣子臨終諫君的嘉言善語；二為「問其疾／論疾」，乃博物君子論疾而及國，呈現天人協調之思維。進而分析兩則特例：第二節論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屬「問疾」敘事，特色為君臣間對話呈現緊張與拮抗。本文由鄭之外交處境切入解析其間語言權力互動。第三節論《左傳》「晉侯夢大厲」，屬「論疾」敘事，特異處為巫醫論疾之語匙少。本文結合《左傳》所記死亡預告與臨終敘事，指出不論夢兆、鬼靈或巫醫，皆指向景公面對命數，不能修德以俟的道德缺陷。總結而言，二例皆以疾病苦難映照國君或國家的沉痾，並以疾不可救的結局，揭示死亡之必然，警醒統治者應擔負的道德課題。

關鍵詞：《左傳》、〈鄭文公問太伯〉、問疾、醫療、語類文獻

*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On the Two Modes of “Inquiries about Illness” in Pre-Qin Anecdotes and Their Variations: Examples from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Zheng Wen Gong Wen Tai Bo” and the *Zuo Zhuan* “Jin Hou Meng Da Li”

Tsai, Ying-Y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pre-Qin narratives of “inquiries about illness” (問疾) in transmitted and excavated texts, focusing on their recurrent structures and linguistic patterns. It identifies two major types. The first, the “inquiring-after-illness” narrative, depicts a ruler visiting a dying minister who offers counsel on statecraft. The second, the “inquiring-about-illness” narrative, shows ministers probing a ruler’s illness, extending discussion from the body to the state and articulating a correlative vision of person and cosmos. Against this framework, the article analyzes two exceptional cases: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text “Zheng Wen Gong Wen Tai Bo” and the *Zuo Zhuan* account “Jin Hou Meng Da Li”. The former, though of the first type, reveals tension over discursive authority; the latter, of the second, downplays shamans and physicians, foregrounding the ruler’s moral failure. Both cases suggest that illness reflects deeper political disorder, underscor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and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rulers.

Keywords: *Zuo Zhuan*, “Zheng Wen Gong Wen Tai Bo”, “Inquiries about Illness”, Medical, Discursive Texts

論先秦的兩種「問疾」話語模式及其變例： 以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晉 侯夢大厲」為例*

蔡瑩瑩

一、問題的提出

疾病可謂是古往今來人類共通的生命難題，而疾病一旦產生，如何理解與治療，則在生理或醫學層面的措施之外，也在文化、心理、道德層面，產生各種不同的詮釋。在先秦子、史文獻，乃至新見出土材料中，也可見到諸多以「疾病」為背景的主題與談論，本文嘗試綜合先秦時期的語類文獻與短篇事例，指出兩種以「疾病」為背景框架的常見話語模式，並提出兩個較為特殊的個案，探究其中疾病隱喻與敘事理路。

（一）「問疾」與「問其疾」：先秦的兩種「問疾」情境與話語模式

綜觀先秦以「疾病」為主題的問答語類，我們可發現有兩種用語：「問疾」與「問其疾」，這兩個用詞不論在構詞或實際行為上，實有細微不同。《禮記·坊記》的一段文字能很好地說明二者差異：

* 本文原題為〈應病與藥或疾不可為：談先秦的兩種「問疾」敘事模式及其特例〉，宣讀於上海同濟大學主辦「第三屆《春秋》學國際學術會議暨第五屆海峽兩岸《左傳》學會議」（上海：同濟大學經學研究院，2025年6月14-15日），承蒙與會師長多所鼓勵與討論。投稿後復蒙二位不具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得以補苴訂謬；文稿修訂則有賴本人114年度國科會「《古本與寫本——近世《左傳》編纂的學術史考察與反思》專書寫作計畫」助理姜如蔚、紀柔暄同學協助校對與訂補書目，謹此一併誌謝。

君子遠色以為民紀。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¹

前「問」字即為「慰問、探視」義，後「問」字才是「詢問」義，意為由於「男女授受不親」，故君子對於婦人有疾，可以探望慰問，但不詢問具體病況細節，以免有查探對方身體私隱之嫌。²

由此，我們可將「問疾」與「問其疾」分為二類。第一類「問疾」，近似今之「探病」，即當某人遭遇疾病時，他人前往探視、慰問，以表達對「人」的關懷為主，不一定談及病況細節。在先秦文本中，問疾／探病的情境與今日相差不大，屬人際常見禮節，如《論語·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³乃孔子傳達對患者的關懷與悲憫。在《左傳》中，還可見利用「問疾」達成其他目的，如襄 25 年「崔杼弑君」之背景：

莊公通焉（案：崔杼之妻姜氏），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⁴

齊莊「問崔子」，名為慰問，實則藉機與姜氏私通。又如昭 20 年《左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卷 49，頁 4。）

華、向二族作亂，以「有疾」引誘公族子弟造訪慰問而遂拘執之，以此手法殺害六人。由上二例可見，「問疾」與今日相似，屬常見的人際互動禮節，有心人士方能藉此掩護其他不倫、不法之舉。

「問疾」情境中，探病者以「存問、慰問、探視」病患為主，不必然「詢問」

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影印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卷 51，頁 27。

² 《禮記》孔《疏》云：「謂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略問增損而已。」，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51，頁 27。

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頁 116-117。

⁴ 本文凡引用《左傳》原文及其注、疏，皆據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影印清嘉慶 20 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卷 36，頁 4。為免繁瑣，以下謹於引文後括號標明卷數、頁碼，不另出注。

病因或討論病情，如上舉《左傳》可見，探病者表達關心，與病患不必然產生對話。但當然，既已前往慰問，那麼討論疾病的話題也可能隨之出現，如昭 20 年《左傳》：

齊侯疥，遂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卷 49，頁 10。)

《左傳》並未記載前往問疾的諸侯賓客有哪些言辭。而接下來梁丘據與裔款的身份為齊侯近臣，其言論指向齊侯之病乃由於祝固、史嚚祭祀不力，亦即為齊侯之疾找到主責（或替罪羊），這屬於討論病因或治療方法而非慰問。由「為諸侯憂」、「諸侯不知」等語可見，前往慰問的諸侯賓客，應表達了對病因的疑惑與探問，才有「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的回應。這就進一步引出本文細分的第二類「問其疾」之例。

如前引《禮記》，先秦文本中，可見「問（某人）疾」、「問其疾／病」等詞例，亦即在「問」與「疾／病」之間，加入間接賓語或所有格（即患者），可語譯為「探問他的病況／病因」，亦即在慰問後，進一步討論病情、探問病因，主題遂轉而聚焦於病症。如宣 2 年《左傳》記趙盾初遇靈輒：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卷 21，頁 11。）

趙盾「問其病」，靈輒答以「不食三日」，是回答「病因」，可見趙盾之「問」不僅慰問，也有「詢問」義。又如《國語·晉語八》載子產聘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⁵

子產聘晉，恰逢平公有疾。由《國語》記載可知他與韓宣子的對話發生在「客館」，顯然子產沒有真正前往慰問探視，故此處的「客問君疾」解為「詢問」君主的病情

⁵ 清·董增齡：《國語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頁 558。此事同見於昭 7 年《左傳》，詳下文。

較佳。由韓宣子答「疾久無除」可證其重在呈現病情，而「夢黃熊」則為可能的病因，並尋求子產的解答或建議。由上可見，「問其疾」之「問」，確有詢問、討論疾病的意思。相似故事還見於《左傳》（詳下文）、《說苑·辨物》。⁶

筆者以為，上述「問疾」與「問其疾」兩種環繞疾病而略有不同的情境，進一步延伸出了兩種不同的敘事框架，分別適用於先秦兩種不同主題的語類文獻或短篇事例（anecdote）。分述如下：

第一類「問疾」，如上引《左傳》或《論語》之例，重在對病患的慰問。慰問者的話語不一定會被詳細記錄，如上引齊莊公、宋群公子的例子，就沒有記載慰問的實際言語。但從病患一方來說，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⁷在若干歷史情境中，我們可見病患面對探視慰問，遂有交代後事，或討論繼任者的言論。⁸基於類似原則，在以「問疾」作為背景的語類文獻中，對話模式常見：患病之臣子，面對國君慰問，提供關於治國、修身等「嘉言善語」，形同生命最後之贈言。如先秦最常見的管仲疾病故事，《韓非子·難一》：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⁹

⁶ 見漢·劉向著，趙善治疏證：《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頁547-548。

⁷ 語出《論語·泰伯》，其「曾子有疾」二章，均記曾子臨終之善言。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138-139。

⁸ 如莊32年《左傳》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卷10，頁23。）昭20年《左傳》載：「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卷49，頁20。）又如襄13年《左傳》載楚共王臨終之言：「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卷32，頁4-5。）此類有關繼承者的討論，當然僅限於病患身份為國君或執政者。

⁹ 陳奇猷集釋：《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頁800-801。

與此相似的內容還可見《莊子·徐無鬼》、《呂氏春秋》之〈貴公〉、〈知接〉諸篇，《管子》之〈戒〉、〈小稱〉諸篇，以及《說苑·權謀》、《史記·齊太公世家》亦取此事，其內容大同小異，不一一引用。在此事件中，齊桓對管仲既是慰問，也是求教：「不幸卒於大命，奚以告寡人」。病重的管仲則知無不言，提出用人方面的建議。敘述者最後以齊桓不聽勸諫導致「蟲出尸不葬」的惡果，證明管仲之言確為救國良策。於是我們看見，身患重病的賢臣，化身「上醫醫國」之形象，¹⁰給予治國解方或推薦賢良；前往慰問的國君，則有如等待醫囑的患者，二者形象產生微妙的翻轉。

第二類，即「問其疾」的對話，如前所述，主題以「病」為主，則引出各種「論疾」之語，亦即探病者開始講解致病的原因或來源。這類談論，原本應屬於巫醫、筮史之專長，古者相信疾病來自鬼神或祖先，透過卜問、占夢等手段，知曉對方的身分、意圖與應對之法，才能解除疾病，此種思維早已見於商代卜辭。¹¹而在春秋戰國文本中，則可見巫醫、筮史外，又有博物君子、時賢大夫，也加入了「論疾」的話語行列，貢獻了許多有關先秦醫療知識、文化的論述，如子產即常見「論疾」文辭，昭7年《左傳》載：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卷44，頁9-11。）

此事與上引《國語·晉語八》為同一事，《左傳》未記載子產「問疾」的環節，然參照《國語》紀錄，概可推測因晉侯病重，只能透過韓宣子了解病情。不過此處的重

¹⁰ 語出《國語·晉語八》，相關討論見本文第三節。

¹¹ 相關研究眾多，參看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頁1327-1345。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12月），頁485-576。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臺北：華岡出版社，1977年）。宋鎮豪：〈商代的巫醫交合和醫療俗信〉，《華夏考古》第1期（1995年3月），頁13、77-85。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收入林富士編：《宗教與醫療》（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9-67。趙容俊：〈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者的醫療活動〉，《史學集刊》第3期（2004年7月），頁7-15。其他另見下文「前人研究述略」。

點，顯然是子產憑藉其博學多聞之才，解讀「夢黃熊」之兆，說明晉侯的病因乃「未祀夏郊」；並由最後的「晉侯有間」證明子產所論不虛。「問其疾」言論不同於前一類「問疾」的對話模式，在此，患者或其代理人才是「發問」的一方，而探病者／慰問者則給予解答；又其內容雖涉鬼神，但也時見人文理性的精神閃耀其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時期的士階層，更重視人自身的修德存養，勝過對神鬼的崇拜。類似談論還可見於昭元年《左傳》載子產論「實沈、臺駘」事（詳第三節），以及前引《左傳》載齊侯疥欲誅祝史後晏子乃詳論「鬼神」事。¹²

比較上述「問疾」與「問其疾」延伸出的兩種語類文獻的對話模式，可以看出二點既同且異的言談特色：

一、就說話者身份言，「問疾」情境中，語類文獻常見患病的臣子，在生命的最後，仍奉獻治國良策給予前來慰問的君主。而在「問其疾」情境中，多數語類文獻會透過臣子探視國君之病，轉為「論疾」文辭，內容包含當時的鬼神／宗教、文化思想，也可能進一步勸諫國君採取特定行動以消除疾患。

二、就疾病的對治言，第一類「問疾」情境中，疾病實非交談的主題，病患與探訪者談論治國之道，至於患病的臣子該如何治療？能否康復？可謂無人著墨。而在「問其疾」情境中，疾病確實是話語的重點，但往往也聯結、隱喻國家的治理，以患者／國君之康復或死亡暗示國家走上正軌或毀敗。換言之，在上面兩種情境裡，說話者往往都是臣子，內容均可見由身體之疾連結到國家之病，此為二者之所同；但差異在於說話者有患病者與探病者的身份差異，話語的情境主題也有所不同。可簡單表列比較如下：

¹² 參看昭 20 年《左傳》記錄晏子反對誅于祝、史的言論：「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卷 49，頁 10-12。）其大意以為有德之君內外和順，自然鬼神致福，祝史陳辭有孚；相對的，荒淫之君導致民人苦病，夫婦皆詛，還要祝史矯誣、僭慢於鬼神，自然不受庇佑。文長不詳引。

	「問疾」之語	「問其疾」之語
行為	慰問病人。重點在人事。	討論病情、病因。重點在治病。
提出問題	詢問治國之道、最後遺言。	為何生病、如何解釋病因。
主要說話者	病患：臣子。	慰問者：臣子、賓客、巫醫。
話語主題	貢獻治國良策、嘉言善語。	論述病因，分析病情，提供療法。
結局	患者病死。慰問者聽或不聽勸諫產生不同後果。	患者聽從慰問者之言而康復；不聽從則可能死亡。

如上表所示，「問疾」與「問其疾」兩種話語模式，前者可概括為「病臣諫君，其言也善」；後者可概括為「臣問君疾，論病及國」。而前賢對古代疾病論述的相關研究，也可由此二種類型切入討論。以下即略述前人研究成果。

（二）前人研究述略

目前有關先秦疾病、醫療的相關研究題材或對象，大多數針對本文第二類的「問其疾／論疾」，亦即「疾病論述」的研究。這些關於古代醫療與疾病論述的討論，¹³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主要研究素材為先秦兩漢醫療文本中的疾病論述，聚焦探討人身如何隱喻家國、倫理乃至宇宙運行，又如何將身體治癒連結到政治治理；並同時分析這些疾病論述的相關核心概念如「氣」或者當時的宗教思維。如杜正勝《眉壽與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¹⁴從古代醫療的方法，開展到背後的形神觀念、生命禮儀等深刻內涵。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理課題〉、〈先秦至漢代禮俗中有關厲鬼的觀念及其因應之道〉諸文也論及疾病詮釋與鬼神觀念；¹⁵蕭登福〈先秦冥界思想探述〉¹⁶論及若干鬼靈致病的案例；金仕起專書

¹³ 案：先秦以降的醫療文本，以及醫學學科專業如中醫、中藥理論與研究，因時代與學科專業不同，暫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相關學科分野的討論可參看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5 年），頁 7-60。

¹⁴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

¹⁵ 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理課題〉，《成大中文學報》第 13 期（2005 年 12 月），頁 59-94。林素娟：〈先秦至漢代禮俗中有關厲鬼的觀念及其因應之道〉，《成大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3 年 6 月），頁 1-46。

¹⁶ 蕭登福：〈先秦冥界思想探述〉，《鵝湖月刊》第 137 期（1986 年 11 月），頁 34-44。

《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綜合分析各類古代醫學文本，¹⁷單篇論文〈晉平公病案鉤沉〉¹⁸則針對個案（即上文子產例）進行分析。

第二類則主要在歷史、考古學、人類學等研究領域，關注古代疾病治療者的身份——巫醫，包含其歷史文化、技術乃至地位轉變。對巫者、巫術、巫醫等專門研究如林富士的巫者相關研究，¹⁹李零《中國方術考》、²⁰〈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²¹梁釗韜《中國古代巫術》，²²鄒濬智〈原巫：試說中國先秦「巫」文化的演變〉²³等。此外、張振平、王新中、尉書明、金仕起、沈晉賢的研究，針對於古代巫者如何應對疾病做出考察。²⁴另外若干研究更仔細討論「巫」與「醫」的同源與分流、身份轉變等細節，如鍾克勳、李建國、馬力、黃曉峰、鮑曉東都對先秦「巫醫」分流的時間點做出考察與詮釋。²⁵

第三類的研究題材則是近世出土大量醫療相關文獻的研究，也包含文字校定與

¹⁷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¹⁸ 金仕起：〈晉平公病案鉤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2009年5月），頁1-50。

¹⁹ 見林富士：《巫者的世界》（廣東：廣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林富士：〈「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年12月），頁671-738。林富士：〈中國的「巫醫」傳統〉，《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頁61-150。

²⁰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

²¹ 李零：〈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41-82。

²² 梁釗韜：《中國古代巫術》（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²³ 鄒濬智：〈原巫：試說中國先秦「巫」文化的演變〉，《醒吾學報》第39期（2008年12月），頁201-221。

²⁴ 張振平：〈一個應當重新認識的問題——巫、巫醫極其與醫藥起源、發展關係探析〉，《山東中醫學院學報》第10卷第2期（1986年5月），頁57-62。王新中、尉書明：〈巫文化對古代醫學的影響〉，《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17卷第1期（2001年2月），頁35-36、65。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分與地位〉，《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年3月），頁1-48。沈晉賢：〈醫巫同源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197-201。

²⁵ 鍾克勳：〈「巫醫」小考〉，《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8月），頁86-87。李建國：〈先秦醫巫的分流與鬥爭〉，《文史知識》第1期（1994年1月），頁39-42。馬力：〈醫巫同源與分離〉，《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8年11月），頁51-54。黃曉峰：〈周代民間宗教信仰的一個側面——以巫的演變為視角〉，《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1999年10月），頁13-20、25。鮑曉東：〈試論巫文化中「巫醫一體」的盛衰〉，《江西中醫學院學報》第15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24-26。

註釋。從前述商代甲骨卜辭中的醫療紀錄、楚簡中的方術材料，²⁶直到馬王堆漢墓所見〈五十二病方〉等十餘種醫書，張家山漢墓所出〈引書〉等，相關研究從文字考釋、中醫藥理論到思想特色，可謂汗牛充棟。²⁷各類中醫理論研究，也可見徵引傳世與出土文獻參照佐證。²⁸因與本文主題僅間接相關，不一一徵引。

上述有關先秦兩漢疾病論述之研究，有兩個本文極為認同的重點。其一是這些疾病論述，常見「身國互譬」、「君國一體」的現象：²⁹疾病從人體生理上的不適，轉而隱喻國家、天下乃至宇宙的失序。如林素娟指出：

先秦乃至漢代認為造成自然與人身之疾病的重要原因，一則由於陰陽之氣的失調，另一則由於德行及倫理的失常，而二者實又密切相關。³⁰

論疾者由德行有失或陰陽不調（包含產生祟、厲）來理解疾病之根源；而治療疾病，也就代表著運用正確的禮儀、祭祀，乃至反身修德等「藥方」，將天下、國家重新導向正軌，此一身國互譬的言論，展現了古代天人相與或天人合一的思維。

其二，疾病治療者，能準確判斷疾病之根源並找出對治之方，甚至能預告患者死亡之日。這個角色早期由巫醫、筮史等職人擔任。林富士曾詳盡討論中國的「巫醫」傳統，指出「巫」為醫藥之源頭，乃至古代療疾，也有「先巫後醫」的觀念，亦即古人遭遇疾病，傾向先求「巫」解讀病因，其次才尋求醫者提供治療手段。³¹儘管巫醫——主要是巫——經常遭受士大夫階層的抨擊、排擠，漢代以後甚至常見「禁巫」之策，但整體而言，巫者對疾病的解讀與治療論述，在整個先秦兩漢時期，仍

²⁶ 如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馮春：〈醫籍文獻中的楚地「巫覡」方術研究〉，《江漢論壇》第12期（2009年12月），頁81-84。

²⁷ 相關綜整研究可參看馬繼興：《中國出土古醫書考釋與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劉孝聖：《醫療與身體——以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金仕起：〈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文本的書寫與編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5期（2021年5月），頁1-84。

²⁸ 如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

²⁹ 相關論述極為豐富，可參看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2分（1998年6月），頁205-244。金仕起：《論病以及國——周秦漢方技與國政關係的一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³⁰ 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理課題〉，頁19。

³¹ 可參看林富士：〈中國的「巫醫」傳統〉，《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頁61-150。

有廣泛的影響力。³²這類研究提醒我們，現代人面對疾病，傾向以科學的醫療手段為主，加以漢代以後巫者地位的持續下降，這讓我們很容易忽視了先秦時人面對疾病時，巫者論疾的權威性，可能與醫者不相上下，甚至更高。

儘管前賢已有豐富的研究，但本文認為仍有些許討論空間：首先在本文的分類中，第一類「問疾」故事，多不在上述疾病研究的討論範圍內。當然，如前述，「問疾」故事的主題並非討論疾病，多數研究對此沒有太多著墨，也屬合理；但這類故事仍以「疾病」為背景，並在先秦政治倫理論述中發揮一定的敘事功能，筆者以為仍值得稍加留意。尤其是近年出土文獻頗有類似的篇章，值得結合既有的問疾故事模式進行更豐富的詮釋與理解。其次有關第二類「問其疾」故事中的論疾文辭，儘管研究頗豐，但仍有少數特殊案例，似乎無法直接導向上述所謂身國互譬或論病及國的詮釋，故論者對其敘事意圖的解讀，仍頗有歧異之處，也值得重新思索。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提出兩個特殊個案，分別討論先秦「問疾／問其疾」兩類敘事的未盡之意。其一為清華簡第6冊的〈鄭文公問太伯〉，相關研究多集中在考證其中人物身份與鄭國歷史。若干學者如 Rens Krijgsman（武致知）、Paul Nicholas Vogt（侯昱文）則注意到〈鄭文公問太伯〉的「臨終」（death bed）敘事框架，³³但討論有限。筆者以為，若將此文本，放在先秦「問疾」一類的短篇事例中進行考察，更能夠凸顯本篇出土文獻的特色。其二則為《左傳》中著名的「晉侯夢大厲」事件，此事件涉及夢境、鬼靈復仇、疾病論述，相關討論詮釋多集中於前二者，而其中對於疾病的態度與解釋，乃至敘事者的意圖究竟如何理解，也就是第二類「問其疾」敘事中的常見主題，筆者以為仍還有解釋的空間。以下即分別就此二個案進行析論。

³² 可參看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

³³ 黃德寬、夏含夷主編，武致知著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Vogt, Paul Nicholas, "Towards a Metavocabulary of Early Chinese Deathbed Tex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 清華簡國際研討會, Hong Kong and Macao, 26-28 October 2017.

二、問疾：〈鄭文公問太伯〉的敘事與言辭特色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6冊有〈鄭文公問太伯〉甲、乙二抄本，³⁴內容為鄭文公與臣子太伯的互動與對話。前賢研究多集中在考證其中人物身份，包含太伯、孔叔、佚之夷、師之佖鹿、堵之俞彌、詹父等，學者如李學勤、王寧、子居、程浩、簡欣儀均提出相關推論。³⁵此外學者也運用此篇與《左傳》相關史事互證，如黃聖松〈《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之文本時間與鄭卿考論〉指出本篇記載應以鄭楚交好為背景。³⁶王榆禎、白星飛、鄭榆家、程浩，以及各類「集釋」著作，也綜合運用本篇與其他鄭國史料互證。³⁷

在這些前行研究基礎上，我們可進一步探討〈鄭文公問太伯〉敘事情境與言辭特色。依據上節定義，〈鄭文公問太伯〉屬於「問疾」對話模式，然而又有兩個較為特殊之處：一是較凸顯慰問者的話語與權威；二是病重的臣子，並未表現出「其言也善」的特質。以下分別析論之：

³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119-126。又，甲、乙本內容基本相同，又以甲本較為完整，以下引用以甲本為主。

³⁵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第3期（2016年3月），頁79-83、97。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第3期（2016年3月），頁84-87。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之「太伯」為「洩伯」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5月8日，網址：<http://m.bsm.org.cn/?chujian/6704.html>（2025年4月23日上網）。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2016年5月1日，網址：<https://www.getit01.com/p201806173111733/>（2025年4月23日上網）。程浩：〈清華簡新見鄭國人物考略〉，《文獻》第1期（2020年1月），頁20-32。簡欣儀：〈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人名蠡測〉，《淡江中文學報》第48期（2023年6月），頁119-156。

³⁶ 黃聖松：〈《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之文本時間與鄭卿考論〉，《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38期（2023年11月），頁35-50。

³⁷ 王榆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白星飛：《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鄭榆家：《清華簡中鄭國事類簡集釋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程浩：《出土文獻與鄭國史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朱忠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8年）。胡乃波：《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集釋》（保定：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8年）。

(一) 鄭文公問疾的語言特色

〈鄭文公問太伯〉開篇即展現典型的「問疾」情境：

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太伯有疾，文公往問之。君若曰：「伯父，不穀幼弱，閔喪【1】吾君，譬若雞雛，伯父實被覆，不穀以能與就次。今天為不惠，或（又）援然，與不穀爭伯父【2】，所天不豫伯父，伯父而□□□□□□□□□□[不]穀？」³⁸

儘管簡文部分殘缺，但仍可看出文公以上位者兼慰問者的身份，前往關懷患病的臣子太伯。而文公的話語，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許多研究者已指出，本篇記文公之發話以「君若曰」開頭，似乎有意仿擬《書》體「王若曰」，這種訓誥口吻，更強調問話者的地位與權力。³⁹若我們參照先秦其他「問疾」對話，其實絕少看到慰問疾病者用「君若曰」一類訓誥體發話，因為這類問對模式中，主要的話語權乃在病患，如以下例子：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卷 49，頁 20。）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愿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孫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戰國策·魏策一》節引）⁴⁰

³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頁 119。案：本文引用採寬式釋文，少部分文字釋讀與斷句參照前述研究進行微調。

³⁹ 本篇整理者已提出：「君若曰，與《尚書》王若曰同例」（《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頁 120）。黃德寬、夏含夷主編，武致知著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 6》則進一步申說：「The example from *Zheng Wen Gong wen Tai Bo is interesting for its introduction of the dialogue, jun ruo yue 君若曰 "The ruler said to the effect." This structure echoes the wang ruo yue 王若曰 "The king said to the effect" formula often seen in the Shang shu and as such marks the speech as a form of paraphrase with a hint of royal gravitas.」（頁 48）。案：目前傳世文獻中，君臣問對通常以「公曰、某君曰、某侯曰」等表現君主一方的講話，又，感謝匿名審查人補充，「君若曰」的例子非常少，僅《國語·越語上》一例，且該「若」字也可能作「假設、假若」解。足見〈鄭文公問太伯〉用詞的特殊性。

⁴⁰ 漢·劉向輯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260-1261。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管子·小稱》節引）⁴¹

《左傳》記子產臨終叮囑子大叔為政原則，而子大叔甚至沒有發問的話語紀錄，僅呈現出聆聽、受教的樣貌。魏惠王探視公叔座，提問若其病卒，該由誰來輔佐，最終又因不聽勸而被批評為「悖」。管仲疾病如前述，是最常見的例子，桓公的發問用「仲父」、「詔」等語，凸顯對管仲的尊崇。並且，上述例證的君臣之間以「問曰」、「對曰」互動，罕有「君若曰」這樣的開頭。我們可說，〈鄭文公問太伯〉以仿擬《書》體的用語，無形中更強調了「問疾者」的地位與語言表現，不同於其他「問疾」敘事中，病患／臣子言論的權威性高於問疾者。

第二，承前，鄭文公之講話，除了凸顯自身地位外，還比起一般慰問者還多了不少內容：前半部先強調自己幼年即位，乃因太伯「被覆」，並接著哀嘆上蒼不惠。綜觀先秦的探病慰問之語，鄭文公的陳述實則較不常見，因為在一般「問疾」敘事中，探病者多直接詢問國事，而相對省略回憶過去事蹟，如上舉惠王逕問「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桓公也直言若「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鄭文公的後半段話語因簡文殘缺約十字，王寧推測是「伯父還有什麼話要教導我？」⁴²若然，此句才較符合常見問疾敘事的提問，即請求病患在最後給予建言。通觀鄭文公前、後段言辭比重，我們可說，相較於常見問疾敘事，文公的文辭顯得特別長，並強調自身「幼弱」與太伯的「被覆」，似有意重新確認臣下對自己的支持。

上述鄭文公言語的特殊表現，都傾向於確認自身權威之正當與臣子的支持。筆者以為，此正反映了鄭文公與臣子在政策上意見相左的焦慮。結合《左傳》所記鄭文公時期的歷史背景，或可更好理解此種傾向。

鄭文公在位共 45 年（前 672-前 628），期間與臣子在外交政策上，頗見齟齬。

⁴¹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608-609。

⁴² 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釋文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 年 5 月 30 日，網址：<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2809>（2026 年 3 月 2 日上網）。而若根據前文鄭文公回顧太伯「被覆不穀」的論述，也可能是憂慮太伯之外，誰能繼續擁護自己？

文公在位前期，意圖從楚，但多數臣子則傾向從齊，雙方意見相左。此事在《左傳》有不少記載：

僖 3 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卷 12，頁 8。）

僖 5 年：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卷 12，頁 21。）

僖 7 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卷 13，頁 2-3。）

僖 3 年楚人伐鄭，文公便欲屈從，遭孔叔反對。五年齊桓召諸侯盟於首止，謀定王世子；鄭文本亦參與，卻因周王挑唆，中途逃歸不盟，⁴³孔叔再度勸阻無果。七年齊伐鄭，孔叔又諫，文公這才亡羊補牢、請盟于齊。八年周襄王即位，實即五年齊桓謀定之太子鄭，文公眼見情勢轉變，乃有「乞盟，請服」之舉。⁴⁴關於鄭文公早期之外交傾向，黃聖松〈《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之文本時間與鄭卿考論〉提出鄭文公「獲彼荊寵」，應指魯僖三至五年事；而本文要補充的是，關鍵應是五年首止之盟時，周惠王因偏愛王子帶，乃以「撫女從楚」為說，希望文公不參與盟會，欲使齊桓「定太子」之舉生變。也正是因為有「王命」可恃，鄭文公才能對霸主之召、臣子之諫置若罔聞。

而在鄭文公統治後期，即齊桓卒後不久，晉公子重耳崛起。此時鄭文公再度倒向楚國；而臣子則呼籲支持重耳，雙方仍有矛盾。僖 23 年《左傳》記重耳流亡及鄭：

⁴³ 首止之盟，涉及周王室王子帶、太子鄭之爭。杜《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又云「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卷 12，頁 21。）惠王偏愛王子帶，因此以「從楚」拉攏鄭文公不參與盟會，欲使齊桓「定太子」產生變數。也正因有「王命」可恃，文公才對臣子勸諫置若罔聞。

⁴⁴ 案：僖 7 年末周惠王薨逝，意味著此前許諾鄭文公「撫女以從楚」的保證不再有效，失去王命倚仗的文公便也無力拒絕齊桓召盟，8 年《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卷 13，頁 6。）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卷 15，頁 11-12。）

叔詹苦心勸諫，鄭文公仍無禮於重耳。就連重耳返國繼位後，鄭依舊翕然從楚圍宋，引燃了晉楚城濮之戰的導火線。⁴⁵城濮一戰，晉國霸主之位確立，於是有踐土之盟。此時的鄭文公方追悔而補救，但仍遭到晉報復。僖 28 年《左傳》：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卷 16，頁 23。）

僖 30 年《左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卷 17，頁 4。）

由上述可見，〈鄭文公問太伯〉中文公自述得太伯「披覆」擁戴，但參照《左傳》可見，文公與臣子在對外政策方面，幾乎從無和諧、齊心之時。而本篇饒富趣味的敘事與對話張力，亦在於此：鄭文公殷勤慰問是表，其背後則暗示君臣間不無緊張關係，並且企圖再次確認太伯的支持。

令人玩味的是，病篤的太伯，面對文公慰問似乎並不領情，也並不像其他問疾敘事中的病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反而報以長篇且帶有批判性的「諫言」，直言文公之「不善」。以下即繼續分析太伯答語的特色。

（二）太伯勸諫的語言特色

承上，面對文公慰問，太伯答語如下：

太伯曰：「君，老臣□□□□毋言而不當。古之人有言曰：『為臣而不諫，

⁴⁵ 僖 27 年《春秋》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而《左傳》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卷 16，頁 8、11。）

譬若饋而不式。』……今及吾君，弱幼而孳長，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微莊功，孚淫媼於康，獲彼荊寵，為大其宮，君而狎之，不善哉。君如由彼孔叔、佚之夷、師之巨鹿、堵之俞彌，是四人者，方諫吾君於外，茲詹父內謫於中，君如是之不能懋，則譬若疾之亡醫。君之無問也，則亦無聞也。君之無出也，則亦無入也。戒之哉，君。」⁴⁶

前賢研究多已指出太伯文辭不僅符合《左傳》或《國語》常見講論先君功業的風格，也大程度上補足了春秋時期的鄭國歷史。⁴⁷本文要強調的是，相較於其他問疾敘事中，患病之臣往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慷慨地給予治國良策或篩選輔佐／繼任者，此處太伯言論相當尖銳、具攻擊性：講述先君功業，是為了批評文公；提到良臣孔叔、佚之夷、詹父等，也並非交代繼任者，而是控訴文公對眾臣的勸諫視若無睹。試以前述管仲疾病的言論作為對照，《呂氏春秋·知接》：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⁴⁸

管仲與齊桓的問答情境與本篇相類，皆為臣子將死，給予國君最後建言。但相較之下仍有三個差異：第一、君臣互動不同：齊桓虛心追問，管仲謙辭而後答。鄭文公與太伯則不然，文公之辭已見前述，以慰問為表，但內容以尋求支持的意圖居多，真心求教者少；太伯則帶著某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焦慮而諫，並且言辭犀利，

⁴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頁119。

⁴⁷ 相關研究已見本文第一節之（二）。

⁴⁸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78-979。

表達對文公的不滿。

第二、問疾者成為被批評，而非被信任託付或期許作為的對象。管仲批評諸臣，乃為齊桓之治國計；相比之下，太伯稱頌鄭國先君與國內諫臣，實為反襯文公之不善。換言之，同為「問疾」的互動，管仲與齊桓的問對，展現出君臣的親近互信，鄭文公與太伯則並非典型「君問」而後「臣答」的問對，而更像是君臣離心、各說各話的兩段「獨白」。⁴⁹文公「殷勤慰問」與太伯「疾言諷諫」間的反差，也造就了閱讀時的張力與趣味。

第三、承上，太伯的話語辭氣，筆者傾向王瑜禎的詮釋：「太伯也知道這些話多半是不會起什麼作用。文章在喟歎聲中結束。」⁵⁰亦即太伯雖勸諫，但預設文公不聽從。在前引典型的問疾敘事中，君主至少在慰問當下，仍虛心受教，臣子亦知無不言；儘管敘事者隨後可能補充國君不聽勸的結局，但此乃事後之驗證，並非問對當下之情境。何以太伯疾言直諫但又對文公不抱期待？則我們仍可參照前引《左傳》載錄，鄭伯在魯僖7年以前，可說有「王命」可恃，周惠王既然允諾其「從楚」而逃齊桓之盟，則太伯身為臣子，勸諫又有何用？概只求問心無愧爾。

更有趣的是，太伯最後結語，用一「聞」字貫串、呼應了文公「問疾」的主題：

君如是之不能懋，則譬若疾之亡醫。君之無問也，則亦無聞也。⁵¹

寬式釋文雖有「問／聞」之別，但簡文字均作「聞」，可說體現了先秦語言藝術中一字多義之朦朧（ambiguity）妙用。⁵²這段話中，太伯指責文公不聽從良臣的勸諫，就如身患疾病而無醫者，此時「問疾」敘事的特徵再度展現，病患的身份出現翻轉：

⁴⁹ 黃德寬、夏含夷主編，武致知著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 6》極富洞見地指出此種「獨白」性質，不過他主要針對太伯之言（頁127）。筆者以為文公並未真心尋求太伯的建議或意圖與之對話，某種程度上也近乎一種獨白。

⁵⁰ 王瑜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頁185。

⁵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頁119。

⁵² 針對先秦抄本用字的一字多義現象，已有相當多的個案研究。如鄭吉雄：〈「革」卦「己日乃孚」辨正——再論《周易》異文與一字多義〉，《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3期（2021年4月），頁1-12。范麗梅：《郭店寫本引〈詩〉與儒學經典詮釋意義的形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7期（2020年9月），頁103-142。

有疾者本是太伯，但在其譬喻中，真正痼疾纏身的反而是國君與國家。是以此處之「鬲」，延續貫串全篇的「疾」主題，既有「慰問」義，又因將良臣比擬醫者而有「詢問」義，最後對國君無法接納「治癒」國家的諫言而有「聽聞」義。

綜上所述，〈鄭文公問太伯〉屬於本文所謂先秦常見的第一類「問疾」語類故事架構，但表現出幾項不同的特質：

在角色互動方面，「問疾」故事常見強調「患者」的嘉言善語，慰問者則擔當求教、請益的角色；但〈鄭文公問太伯〉中，探視者與患病者的話語表現均等，甚至「君若曰」的用詞，隱隱強調了探病者的強勢與權威。君臣之間的關係顯得緊張且離心。

在言語內容方面，「問疾」產生的文辭，多為治國之策、用人之方，求教的國君第一時間允諾聽從，隨後敘事者方補充其終究弗聽而導致惡果；但〈鄭文公問太伯〉中，文公與太伯更像是各自獨白，都不預設對方能聽從自己的意見，甚至太伯直接批評文公，更是其他問疾故事罕見的語言表現。

在「疾病」主題方面，第一類問疾故事中，「疾病」主題往往僅作為「引子」，用以帶出治國、用人等論述；然而在〈鄭文公問太伯〉中，太伯的最後話語，帶出了「疾病」的引譬與靈活運用「問」字之多義性，開篇「太伯有疾」／「文公往問」與結語之「譬若疾之亡醫」／「君之無問」遂產生了鮮明且饒富語言趣味的前後呼應，表現出了本篇巧妙的語言藝術。

上述這些獨特的語言表現，本文認為當結合春秋早期鄭國獨特的政治處境與君臣的緊張關係切入分析，才能理解為何常見的第一類「問疾」模式中的臨終善言，在本篇轉而為近乎政治對質之論爭，並且由此可見本篇敘事者當熟悉鄭國歷史與其君臣間的矛盾。

三、論疾：《左傳》「晉侯夢大厲」的臨終敘事與教化意涵

如第一節所述，第二類「問其疾／論疾」模式，乃是先秦疾病與醫療史研究最為關注的素材。此一模式最重要的內容即為探病者的「疾病論述」，而其內涵不只論身體之病，更藉由疾病隱喻國家、社會、宇宙秩序的毀壞；看似神秘的致病根源，實則寓託了身國互譬、君國一體乃至天人相感的意義。

不過，正因如此，當某些「問其疾／論疾」對話中的言論，並非常見的「論疾」模式，也不涉及上述疾病理論時，我們對疾病事件的意義就不免難以掌握，並且產生認識分歧或詮釋多樣的困境。《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可說就是這樣的例子：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卷 26，頁 29-30。）

「病入肅膏」故事，加上晉侯極其不體面的死亡方式，可謂家喻戶曉，但《左傳》敘述此事究竟想表達何種歷史教訓或意義？則歷代眾說紛紜，相關討論涉及夢兆、鬼靈復仇、疾病三個交織錯綜的面向。本文以為，本事例符合「問其疾／論疾」的對話模式，探病者——桑田巫、醫緩——皆對晉侯之病發言。然而，他們的「疾病論述」卻又在夢兆、鬼靈的神秘籠罩下，顯得特別貧乏，是一相對特殊的個案。以下先略述這三個面向的討論與爭議。

（一）夢兆、鬼靈與寡言的巫醫

首先，本篇最為醒目的敘事，即其「夢兆」表現。高蟾《高梅亭左傳鈔》評曰：

此篇以夢為主，巫言如夢，醫言亦如夢也。因夢而疾，因疾而卒也。小臣之殉，亦因夢故也。奇絕幻絕。⁵³

高氏以「夢」為本篇主旨，而如前所述，古者相信疾病源自鬼神或祖先的降災，而夢正是確認來源的手段之一。林富士〈中國的「巫醫」傳統〉即據此例指出：

「惡夢」通常被視為是疾病或疾病的徵兆，因此，召來巫者「解夢」，其實也是在問病因及「預後」。但因巫者認為其病情惡劣，無法醫治，且斷言其死期，因此，病發之後，便轉向秦人求醫。⁵⁴

《左傳》記夢事例極多，且態度值得玩味。張端穗〈左傳對超自然的看法〉即以此例討論「夢」在《左傳》敘事中的曖昧意旨，他指出「晉侯夢大厲」事，「顯示他相信夢與現實人生有必然的關連，而夢又與鬼神的旨意有關」、「作者對夢的排斥似乎沒有前面對卜筮、災疫那麼的強烈」；但同時《左傳》還有其他例子「似乎又告訴我們不必凡事依夢而行」。⁵⁵那麼，夢境究竟能否預示人的命運？各類夢境的載錄，究竟該以理性的角度，或者靈性的詮釋，也就成為問題。換言之，我們不確定《左傳》是否以此事說明夢境可揭示命運，人當依夢而行。

其次，以鬼神角度來說，此事為經典的鬼靈復仇案例。不同於現代的科學思維，古人頗相信靈性世界為真實存有，如著名的子產「論伯有能為鬼」之語。李隆獻〈先秦至唐代鬼靈復仇事例的省察與詮釋〉則指出晉侯之「病」，乃是鬼靈的報復手段，以「夢」為媒介並通過「巫」驗證，並具備「請於帝」的正當性。同時李氏極富洞見地指出，晉侯之疾不可救並非特例，而是歷代鬼靈復仇故事的常見模式：不論人們採取什麼措施，那些為己申冤的復仇之鬼都「必然成功」。因為鬼靈復仇敘事所反映者，實乃撰述者後設的、或讀者所期待的「善惡有報」理念，而並非宣揚鬼神信

⁵³ 李衛軍：《左傳集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979。

⁵⁴ 林富士：〈中國的「巫醫」傳統〉，《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頁95。

⁵⁵ 張端穗：〈左傳對超自然的看法〉，《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出版社，1987年），頁34-38。

仰。⁵⁶但若從此種「報」的角度詮釋「鬼靈」，其實就說明了「鬼靈」未必存在。如姜炳章《讀左補義》即認為是「景公妄殺，抱愧於心」，⁵⁷林紓《左傳擷華》更以「心懷鬼胎」形容之：

《周官》三夢，一曰致夢。……致者，有所致也。種者，因也。晉侯殺趙同、趙括，戮功臣之後，心懷鬼胎久矣。此即所謂致也、因也。⁵⁸

換句話說，晉侯之死，未必真為厲鬼復仇致命，而是心病積久沉痾。則《左傳》記此「大厲」，究竟真有鬼魂為祟，還是晉侯「心裡有鬼」，也指向兩種不同的理解。

最後，我們當然不能忘了貫串本則故事的「巫醫論疾」，周大璋《左傳翼》評曰：

是篇以夢作貫串，人謂晉侯以夢死矣，不知晉侯死於病，非死於夢也。大厲一夢，病之先聲。豎子一夢，病之實證。將食如廁，氣張而陷，則病大作，而疾乃真不可為矣。病與夢攪作一團，而究之夢自夢，病自病。……巫與小臣以有夢而死，醫緩以無夢而生，然則晉侯雖死於病，不可謂非死於夢也。大厲之夢似近於噩，豎子之夢又近於懼與思，眛兆之形，豈渺茫而無憑者歟？嗚呼！晉侯以好殺致夢，又以多夢行殺，心已死矣，欲不死得乎？……左氏描寫無非為天下好殺者儆。⁵⁹

此處強調當分清「夢自夢，病自病」，晉侯染病之事實不可忽視；至於全篇以夢串連，乃至「病與夢攪作一團」，則與前述高蟾的觀察相似，乃左氏文學描寫，意圖儆惕「好殺者」。周氏相當理性地認為晉侯死於病，惡夢只是疾病延伸之「噩」、「懼與思」，也可與前述林紓之說呼應。但如此一來，我們不免對此則故事中的巫、醫角色與遭遇感到困惑：此事例巫、醫並見，實為古代醫療史上極有代表性的材料。如前所述，古代中國治療疾病，有巫先於醫的傾向。若然，有足夠權威「論疾」的桑田巫，雖準確預告了晉侯之死，卻無法預知自身也將因此而死，那麼《左傳》透過此事，究竟欲令吾人信巫或輕巫，也值得玩味。

⁵⁶ 李隆獻：〈先秦至唐代鬼靈復仇事例的省察與詮釋〉，《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263-336。

⁵⁷ 李衛軍：《左傳集評》，頁977。

⁵⁸ 李衛軍：《左傳集評》，頁979。

⁵⁹ 李衛軍：《左傳集評》，頁979。

上述詮釋各有不同，但也有若干相同處，即各家都強調晉景公「死有餘辜」，因其性格好殺、滅人之族；而夢兆、鬼靈、疾病三項因素也相互牽引，共同導致了景公之死。然而，如上文所述，這三者也似乎都不完全是《左傳》敘「晉侯夢大厲」事的真正要旨。究竟《左傳》透過此一綜合了夢兆、鬼靈、疾病的事件，想傳達何種歷史教訓，我們似乎仍未有明確答案。

《左傳》敘此事的意旨之所以模糊，筆者認為正與其中缺乏足夠言論內容有關，在上述各家論述中，對桑田巫與醫緩的「論疾」內容，也鮮少討論。而這種忽略，其實很好理解，因為不論是桑田巫或醫緩，其對疾病的論斷，都可濃縮為四個字：「疾不可為」，即斷言景公必死。此言論雖符巫醫職掌，但實在太過簡要，相較於學者熟悉的第二類「問其疾」（上文第一節引子產論「黃熊」便是一例）往往可見長篇、旁徵博引的豐富論述，桑田巫或醫緩的言辭可說相形失色，也就讓我們無從捕捉敘事者究竟想透過此事講述甚麼道理。

我們以典型的論疾文辭稍作比較，同樣是晉國，平公有疾，昭元年《左傳》載子產與醫和論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壺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卷 41，頁 20-28。）

這段載錄是典型的第二類「問其疾／論疾」敘事，患病者為國君，慰問者兼論述者為臣子／醫者，本文第一節所列舉研究也幾乎都談及此例。⁶⁰要言之，子產先順著晉侯疾病的占卜結果，以長篇解釋「實沈、臺駘」掌故，展現博物君子之文辭特色；接著話鋒一轉，竟言此二者並非致病之由，「出入、飲食、哀樂」才是真正病因，最終導出晉侯娶於同姓，「內實有四姬」之不當。更有趣的是，平公也如景公一樣「先巫後醫」，秦之醫和論述也很豐富，從論定死生到講述六氣、陰陽、易卦，最後甚至從國君之疾預告了「良臣將死」的國運之墜。綜觀子產與醫和所言，正是標準的「臣問君疾，論病及國」。

相較於子產與醫和文辭的豐富多元，桑田巫或醫緩的論疾之語便相形見绌：桑田巫雖準確說出景公之夢，但並沒有豐富的文辭表現，僅「不食新矣」四字預告死亡。醫緩言語雖見載錄，但也只是「醫言如夢」，重複景公所夢「在肓之上，膏之下」。不論桑田巫或醫緩的言論，都沒有「論疾」文辭常見的身國互譬，乃至療疾如治國的論述。這也難怪對於「晉侯夢大厲」之巫、醫功能，歷代討論均不多，因為實在

⁶⁰ 相關論述或從醫療角度分析，見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頁 120-127；或結合晉、鄭、秦三國的政治與歷史背景加以解析，見金仕起：〈晉平公病案鉤沉〉，頁 1-50；論述皆豐富有見。

無從論起，也讓此事成為「論疾」敘事中的一個特例。

但是，筆者認為，「晉侯夢大厲」一事的特殊之處，正在於疾之不可為、無從論，甚至無藥可救：當面對疾病，只剩下「必死」結局，《左傳》的敘事在此隱然指向了疾病所理當延伸出的另一個層次議題：被死蔭籠罩之人，該如何面對生命的最後時刻？以下即略述本文認為晉景公所展現的「臨終」敘事特質。

（二）預知死亡的臨終敘事

實際上，有關晉景公之疾，早在「夢大厲」前即有載錄，成 10 年《左傳》載：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卷 26，頁 28。）

由太子「會諸侯伐鄭」並非晉國慣例，⁶¹這足以說明晉侯病況嚴重。而如前賢研究指出，夢境可作為判斷「病因」依據，而古者療疾觀念中，巫者的判斷有可能高於、先於醫者。則我們應當重新評估桑田巫預告死亡之言的權威性：在古人眼中，其效力很可能就如同今日我們到醫院就診，而被醫生宣告壽命只剩月餘。由此思考晉景公之所以殺桑田巫而不殺醫緩，也可解釋為，正因桑田巫的話語權威較高，才是「究責」對象，⁶²甚至若能否定、推翻其斷言，則疾病還可能有轉圜餘地。在此認識下，我們可說《左傳》所呈現的景公舉措，可謂展露了人在面對死亡壓力下的人性脆弱與不堪。殺桑田巫之舉，無疑是對死亡的逃避或否認；「如廁，陷而卒」的不堪，更隱然批評了這種逃避之舉非但無濟於事，反令自己不得善終，更連累了另一無辜的生命殉葬，即「夢登天」的小臣。⁶³

⁶¹ 參照閔公 2 年晉獻公命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之例，當時里克即勸阻：「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卷 11，頁 11-12。）由此可知太子掌兵，並非常制。

⁶² 如昭 20 年《左傳》載「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乃欲誅「祝史」而未罪及醫者，也是類似的理由。（卷 49，頁 10。）

⁶³ 案：《左傳》對以臣殉葬事，一律持批判態度，如文 6 年秦穆以三良為殉，《左傳》以「君子曰」批評：「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卷 20，頁 11-12。）張端穗：〈左傳對人牲、人殉的看法〉，《左傳思想探微》，頁 49-70，論之甚詳。

前人研究曾提出上節〈鄭文公問太伯〉是「臨終敘事」，筆者以為，〈鄭文公問太伯〉是常見「問疾」主題的語類文獻，其話語內容仍以治國勸諫為主，並不包含對生死的感悟或對生活世界的告別；本節所論「晉侯夢大厲」的敘事細節中，才具備了人面對死亡時的「臨終」討論或思索。換言之，我們可嘗試觀察《左傳》所記人物之死亡預告及其面對方式，透露出什麼樣的生命樣態。⁶⁴以下略舉二例說明之：

文 18 年《左傳》記載齊懿公、魯文公、魯叔仲惠伯，皆在同年被預言死亡：

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卷 20，頁 11-12。）

齊侯在公佈伐魯師期後有疾，醫者言其「將死」。魯文公聽聞後的反應不是備戰，而是讓叔仲惠伯命龜占卜，希求齊侯「令先師期死」（杜注，卷 20，頁 11），這形同咒齊侯速死，如此一來就無法攻打魯國。儘管文公僅針對齊侯死期占卜，卜楚丘的占斷卻預告了三件事：一、齊侯確實死在出師之前，但非因疾病；二、國君將「不聞」

⁶⁴ 案：《左傳》中「預知死亡」的敘事相當多樣，未必都與疾病直接相關。本文觀察著重在《左傳》如何呈現將死之人的最後舉措。筆者曾討論晉趙武之死，也屬相關主題，見蔡瑩瑩：〈不復此矣——從《左傳》趙孟賦《詩》的中、日、英詮釋談詩與史的多義性〉，收入郭院林主編：《大雅當傳：海峽兩岸首屆左傳學高端論壇論文選集》（合肥：黃山書社，2020 年），頁 106-127。

齊侯死訊；三、命龜者同獲凶咎之兆。《左傳》隨即記載此三事之驗：魯文公先齊侯而暴斃；齊懿公則死於邴歆、閻職之報復；至於命龜的叔仲惠伯，則捲入東門襄仲「殺嫡立庶」之亂，亦淒慘見殺。誠如張端穗指出，《左傳》記占筮預言看似神秘，實則隱含對道德的重視：「即令我們要占卜，我們所占卜之事必須符合道德」。⁶⁵三者之死，不僅凸顯卜楚丘占斷之神準，而同時隱含告誡：當死亡或災禍近在眼前，當反身而誠、謹守本分，對他人則不應幸災樂禍。《左傳》透過卜楚丘的三個死亡預告，隱然對三人傳達批判：期待他人速死的文公，實最早死；齊懿公欺凌臣下，終遭反噬；叔仲惠伯聽從文公之意「命龜」而不勸阻此種行為，足見其愚忠，也不得好死。正如前節引「管仲疾病」例中，管仲對齊桓公言道「死生命也，苟病失也」，人皆有一死，如何體面離世，留下什麼典範，才是真正要努力的方向；若國君「不任其命，守其本」，徒然倚仗或咎責於巫卜，終究捨本逐末，乃遭反噬。

正面的例子可見楚昭王例，哀 6 年《左傳》載：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卷 58，頁 2-4。）

同樣面臨戰爭，並且「有疾」、獲不吉之兆，楚昭王面對死亡的態度是坦然且盡責：

⁶⁵ 張端穗：〈左傳對超自然的看法〉，《左傳思想探微》，頁 31。

「死一也，其死讎乎」，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維持國家既定的戰略而行。換言之，疾病確有「不可為」者，但人事方面，楚昭任其命，守其本，堪稱大有可為。而在疾病治療方面，《左傳》又以追述筆法，寫楚昭拒絕將疾患「移於令尹、司馬」，表示自己接受「有罪受罰」；再寫他不願越望祭河，並言「河非所獲罪」。此二件事都表現出，儘管在古人眼中，疾病的根源可能是來自鬼靈或神秘力量的作祟，也可以求助於巫卜等超自然手段，但這並不妨礙人們仍保有是非之心與倫理綱紀，因為就算是鬼神之力，也不應是非不分（將君主之罪轉移於無辜之臣），更不能逾越權限（河神不能管轄楚之地望）。《左傳》引「孔子曰」稱許楚昭王「由己率常」，正說出了不論是人間、天道甚或鬼靈的世界，都應有「常道」可循。而如楚昭王盡力遵循國君的職責，面對疾患問心無愧，最終仍走向死亡，那麼這就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命數，此即孟子所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⁶⁶之理。

回到「晉侯夢大厲」事件，桑田巫能預言晉侯之死卻不能預知自身之禍，這樣的敘述，看似對「巫」傳達一定程度的諷刺；然從另一面來說，相較於桑田巫（以及登天之小臣）對自身命運茫無所知，晉景公則可說不只一次獲得提前知曉自身命數的特權：不論巫或醫，甚至夢境或鬼靈，都同樣明確地對晉景公揭示了「死亡無可避免」的現實。但在生命的倒數時刻，景公除了殺戮外，幾乎毫無作為，相較於上引楚昭王，可謂高下立見。筆者以為此處仍展現一定程度的教化意涵，因為先秦文本中往往強調身為國君，當有敏銳的察識與前知之能，並且也常見以醫病論述表達。《韓非子·喻老》：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

⁶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489。

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公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⁶⁷

此故事說明聖人或明君當在禍患初萌方微時，便妥善應對處理；若放任、逃避、無所覺察，必將走向無可救藥的死地。金式起討論《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也曾闡明此意。⁶⁸

進一步言，察識與前知，不只是來自外部的巫醫之協助，也源於人內在的德性修養，《中庸》論「至誠」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⁶⁹

古者相信人性通乎宇宙，修身養性能贊天地化育，是故疾病不只是人身內部機能的失調，也是人與天地秩序斷聯的表徵，這種人身小宇宙的觀念相當普遍，在先秦思想研究領域已有許多學者闡明。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即指出古者相信「威儀敬慎」的善德能夠影響壽夭的觀念。⁷⁰

綜合上述正反例證，《左傳》「晉侯夢大厲」的敘事與文辭表現特色便可重新理解：其具備豐富的神秘元素：鬼靈、夢兆，巫醫論疾，但偏偏並未呈現常見「論疾」敘事中的豐富文辭，而是著眼於「患者」如何察識與面對「事之禍福」。換言之，《左傳》此則「問其疾／論疾」敘事，實乃聚焦於患者之身，由疾病導向死亡的「臨終」敘事，而夢兆、鬼靈與巫醫之言，都預示、指向了禍福肇始的「腠理之地」：疾病與大厲的出現，代表景公犯下過失，或許是一開始景公之「不義」就召來了死亡的陰影；第二次夢兆則凸顯了景公「疾益深」，而他仍未能率常尋道；最後強而食新、殺巫、陷廁而卒，則批判了晉景公明明擁有特權，提前知曉自身「殀壽不貳」的結局——

⁶⁷ 陳奇猷集釋：《韓非子集釋》，頁 396-397。

⁶⁸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頁 211-270。

⁶⁹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4。

⁷⁰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頁 205-229。

相較於桑田巫不能逃死、小臣夢登天以為福實則速禍的無常——卻仍無法「修身以俟」，只一味逃避、好殺，最後只能以極不體面的樣態走向死亡。

四、結語

本文首先提出先秦的兩種「問疾」情境與話語特質：第一類「問疾」以探病情境為對話背景框架，常見病重的臣子秉持「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態度，對慰問的國君講述治國之道。其身份由病患翻轉為醫者，而國君或國家，才是亟欲尋求良方的患者。第二類「問其疾」或「論疾」敘事，患病者多為國君，由此引出探病者（包含臣子、巫醫、賢人）的「論疾」之語，亦出於「上醫醫國」思維的嘉言善語：包含豐富的醫療文化、民俗、禮儀、宗教等專業內容，最終亦往往指向「身國互譬」、「君國一體」的論述。整體而言，這兩類問疾有關的話語，都以疾病引譬國家社會乃至宇宙的秩序，雖然對話者的醫／病身份倒反，但又皆可見臣子猶如醫者，給予國君治國良方。佛家經典有謂「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予藥，令得服行」，⁷¹先秦諸子亦見將良臣賢者比擬為「良醫善藥」，⁷²可說是中外彼此會通的譬喻。

在確立此二種「問疾／問其疾」的基本敘事框架後，本文接著分別提出兩個特例。其一為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其基本框架雖為第一類「問疾」敘事，然特異之處在於問疾者（國君）的言論與話語權威性被刻意強調，而臣子／患者的勸說之言，則堪稱疾言厲色，並對於國君聽從與否不抱期待，相當於斷言國家或國君沉痾「無醫」。筆者認為本篇當結合鄭國早期特殊的歷史與外交情境並觀，方能解釋其君臣對話間的緊張與拮抗。

⁷¹ 三國吳·支謙譯：〈佛國品〉，《佛說維摩詰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4冊（CBETA, T14, No. 474），卷上，頁519。引自法鼓文理學院：《CBETA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474>（2025年6月1日上網）。

⁷² 《墨子·貴義》：「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404。

其二為《左傳》「晉侯夢大厲」事，其基本框架雖為第二類「問其疾」敘事，然而本當以豐富文辭「論疾」的巫、醫，卻罕有言語表現，《左傳》描寫病患晉景公之惡夢、求醫、殺巫、殉臣等事件，沒有言語上的批判勸諫，而呈現病人無法坦然面對死生有數，更做不到修身率常，反而直到死前都無法改變「好殺」之惡行。本則事例不同於常見「問其疾／論疾」敘事，給予巫醫或良臣正面展現嘉言善語的舞台，而是呈現反面例證，聚焦患者／國君在臨終時刻的錯誤態度。

同時，此二例又有幾處共同的特色敘事展現，筆者以為亦值得深思：在臣子方面，不論是第一例中的太伯或是第二例的巫者，都在身體上遭受疾病或來自君主的傷害，其語言或遭遇，反向映照出了真正病重難治的，乃是國君或國家。而在國君方面，不論是鄭文公或晉景公，都在不同層面上，被醫者或臣子判定為「無藥可救」，這無疑指向了疾病敘事中人們往往不願直面的主題：疾病不一定都能夠治療，也有人力所不能及處，死亡的陰影始終存在。當疾病「亡醫」、「不可為」時，本文舉出若干正面例證說明，仍有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晉景公的例證，則顯然從反面引發我們思考：該怎麼活出最後的尊嚴與彰顯生命的美善，這或許是這二則特殊問疾敘事所發出的大哉問。

徵引文獻

一、古籍文獻

- * 漢·劉向著，趙善誥疏證：《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 * 漢·劉向輯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影印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影印清嘉慶 20 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疏》本。
-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
- *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
- * 清·董增齡：《國語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
- * 陳奇猷集釋：《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2 年。
- *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二、今人論著

- 王新中、尉書明：〈巫文化對古代醫學的影響〉，《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35-36、65。
- 王榆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 白星飛：《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 朱忠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18 年。
- 宋鎮豪：〈商代的巫醫交合和醫療俗信〉，《華夏考古》第 1 期（1995 年 3 月），頁 77-85。
-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臺北：華岡出版社，1977 年。

-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
- 李建國：〈先秦醫巫的分流與鬥爭〉，《文史知識》1994年第1期，頁39-42。
-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
- 李衛軍：《左傳集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第3期（2016年3月），頁79-83、97。
-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 沈晉賢：〈醫巫同源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197-201。
- 林素娟：〈疾病的隱喻——先秦及漢代禮教論述中的身體思維與倫理課題〉，《成大中文學報》第13期（2005年12月），頁59-94。
- 林素娟：〈先秦至漢代禮俗中有關厲鬼的觀念及其因應之道〉，《成大中文學報》第41期（2013年6月），頁1-46。
- 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
-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2分（1998年6月），頁205-244。
- 林富士編：《宗教與醫療》，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林富士：〈「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年12月），頁671-738。
- 林富士：《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
- 林富士：《巫者的世界》，廣東：廣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
- 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分與地位〉，《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

年 3 月），頁 1-48。

金仕起：《論病以及國——周秦漢方技與國政關係的一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

金仕起：〈晉平公病案鉤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1 期（2009 年 5 月），頁 1-50。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年。

金仕起：〈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文本的書寫與編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55 期（2021 年 5 月），頁 1-84。

胡乃波：《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集釋》，保定：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18 年。

范麗梅：《郭店寫本引〈詩〉與儒學經典詮釋意義的形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7 期（2020 年 9 月），頁 103-142。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馬力：〈醫巫同源與分離〉，《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1998 年 11 月），頁 51-54。

馬楠：〈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鄭國早期史事〉，《文物》第 3 期（2016 年 3 月），頁 84-87。

馬繼興：《中國出土古醫書考釋與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 年。

張振平：〈一個應當重新認識的問題——巫、巫醫及其與醫藥起源、發展關係探析〉，《山東中醫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1986 年 5 月），頁 57-62。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出版社，1987 年。

梁釗韜：《中國古代巫術》，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第 20 期（1936 年 12 月），頁 485-

576。

程浩：〈清華簡新見鄭國人物考略〉，《文獻》第1期（2020年1月），頁20-32。

程浩：《出土文獻與鄭國史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馮春：〈醫籍文獻中的楚地「巫覡」方術研究〉，《江漢論壇》第12期（2009年12月），頁81-84。

黃聖松：〈《清華陸·鄭文公問太伯》之文本時間與鄭卿考論〉，《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38期（2023年11月），頁35-50。

黃德寬、夏含夷主編，武致知著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研究與英譯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

黃曉峰：〈周代民間宗教信仰的一個側面——以巫的演變為視角〉，《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1999年10月），頁13-20、25。

鄒濬智：〈原巫：試說中國先秦「巫」文化的演變〉，《醒吾學報》第39期（2008年12月），頁201-221。

趙容俊：〈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者的醫療活動〉，《史學集刊》第3期（2004年7月），頁7-15。

劉孝聖：《醫療與身體——以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蔡瑩瑩：〈不復此矣——從《左傳》趙孟賦《詩》的中、日、英詮釋談詩與史的多義性〉，收入郭院林主編：《大雅當傳：海峽兩岸首屆左傳學高端論壇論文選集》，合肥：黃山書社，2020年，頁106-127。

鄭吉雄：〈「革」卦「己日乃孚」辨正——再論《周易》異文與一字多義〉，《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23期，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頁1-12。

鄭榆家：《清華簡中鄭國事類簡集釋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

蕭登福：〈先秦冥界思想探述〉，《鵝湖月刊》第137期（1986年11月），頁

34-44。

鍾克勳：〈「巫醫」小考〉，《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2年8月），頁86-87。

鮑曉東：〈試論巫文化中「巫醫一體」的盛衰〉，《江西中醫學院學報》第15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24-26。

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頁1327-1345。

簡欣儀：〈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人名蠡測〉，《淡江中文學報》第48期（2023年6月），頁119-156。

Vogt, Paul Nicholas, "Towards a Metavocabulary of Early Chinese Deathbed Tex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 清華簡國際研討會, Hong Kong and Macao, 26-28 October 2017.

三、網路資料

三國吳·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4冊，引自法鼓文理學院：《CBETA 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網站，網址：<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474>（2025年6月1日上網）。

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2016年5月1日，網址：<https://www.getit01.com/p201806173111733/>（2025年4月23日上網）。

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之「太伯」為「洩伯」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5月8日，網址：<http://m.bsm.org.cn/?chujian/6704.html>（2025年4月23日上網）。

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甲本）釋文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5月30日，網址：<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2809>（2026年3月2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Qi You, *Han Fei Zi Ji Shi*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Han Fei Zi] (Taipei: Hua Zheng Book Co., 1982).
- Chen Qi You, *Lu Shi Chun Qiu Xin Jiao Shi* [New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Chun Qiu of L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Qing*] Dong Zeng Ling, *Guo Yu Zheng Yi* [The Explanation of Guo 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3).
- [*Jin*] Du Yu, [*Tang*] Kong Ying Da annot., *Zuo Zhuan Zheng Yi* [The Explanation of Zhuo Zhua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Edition from [*Qing*] Ruan Yuan edit, *Shi San Jin Zhu Shu* [Thirteen Classic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Commentaries] (Jiangxi: Nanchang Prefectural School, 1815).
- Li Xiang Feng, Liang Yun Hua edited, *Guan Zi Jiao Zhu*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Guan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Han*] Liu Xiang, Zhao Shan Yi annot., *Shuo Yuan Shu Zheng* [Annotations on Shuo Yuan] (Taipei: Liberal Arts Press, 1986).
- [*Han*] Liu Xiang, Fan Xiang Yong, *Zhan Guo Ce Jian Zheng* [Annotations of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Qing*] Sun Yi Rang, Sun Yi Kai annot., *Mo Zi Xian Gu* [Annotations on Mozi] (Taipei: Hua Zheng Book Co., 1987).
- [*Han*] Zhen Xuan, [*Tang*] Kong Ying Da annot., *Li Ji Zhu Shu* [Annotations on the Book of Rites]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Edition from [*Qing*] Ruan Yuan edit, *Shi San Jin Zhu Shu* [Thirteen Classic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Commentaries] (Jiangxi: Nanchang Prefectural School, 1815).
- [*Song*] 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Four Books of Notes to Sentences] (Taipei: Ta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6).